

民国史专家力作

军统 特务 活动史

民国第一特工组织的兴衰

马振犊 邢 焯◎著

※ 图文版 ※

海内外最新解密档案
全景展示军统的前世今生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民国史专家力作

军统 特务 活动史

民国第一特工组织的兴衰

马振犊 邢 焯◎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统特务活动史 / 马振犊, 邢焯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55-1013-2

I. ①军… II. ①马… ②邢… III. ①中国国民党—
特务组织—史料②军统局—史料 IV. ① D69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130 号

军统特务活动史

作 者 马振犊 邢 焯
责任编辑 谢艳芝 蔡传聪
开 本 70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13-2
定 价 55.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 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目 录

第一章 军统的产生背景

- 第一节 蒋介石运用特务之肇始 001
- 第二节 “特工之王”崭露头角 009

第二章 初露峥嵘

——军统前身特务处时期

- 第一节 蓄 势 015
- 第二节 暗 杀 020
- 第三节 情报与策反活动 030
- 第四节 戴笠西安“救蒋” 040
- 第五节 特务处在抗战初期的活动 042

第三章 自立门户

——抗战时期的军统局

- 第一节 军统的成立和发展 051
- 第二节 “戴老板”的手腕 076
- 第三节 扩张、控制和渗透 111
- 第四节 组建境外特务网 122

第四章 隐蔽战线

——抗日秘密战

- | | |
|-----------------|-----|
| 第一节 对日情报、破坏和防谍战 | 133 |
| 第二节 势遏奸逆 | 148 |
| 第三节 抗日游击 | 166 |
| 第四节 中国的“黑室” | 180 |

第五章 高下立判

——与中共的较量

- | | |
|--------------------|-----|
| 第一节 军统对延安的渗透及失败 | 184 |
| 第二节 重用张国焘图谋的失败 | 193 |
| 第三节 中共“七人小组”刺入军统心脏 | 198 |
| 第四节 重庆大本营的反共活动 | 203 |
| 第五节 利用伪“黄洲国军”反共 | 205 |

第六章 斗争利用

——与汪伪的特工战

- | | |
|-------------------|-----|
| 第一节 刺杀汪精卫 | 206 |
| 第二节 军统南京区的重建与瓦解 | 211 |
| 第三节 军统上海区的活动与崩溃 | 217 |
| 第四节 “花花公子”深入“虎穴” | 228 |
| 第五节 在广东、浙江刺杀伪政权头目 | 236 |
| 第六节 对日伪的货币战 | 237 |

第七章 对外合作

——与国外谍报组织的交往

- | | |
|-----------------|-----|
| 第一节 军统与苏联情报合作揭秘 | 240 |
|-----------------|-----|

- 第二节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始末 249
第三节 中美英三方情报合作会议及其意义 280

第八章 配合反攻

——抗战胜利前夕军统组织的活动

- 第一节 配合“豫湘桂战役”作战 291
第二节 准备迎接美军登陆作战 295
第三节 抗战胜利前夕的作战 297

第九章 难挽狂澜

——抗战胜利后军统组织的膨胀与危机

- 第一节 蒋戴关系之异变 302
第二节 “接收”与“肃奸”中的丑行 313
第三节 参与原子弹研制计划 321
第四节 重庆谈判中军统被迫保护中共领袖 326
第五节 军统基层组织的活动 327
第六节 戴笠之死及军统的苟延 334

第十章 走向末路

——逃台前的保密局

- 第一节 军统改组保密局后的活动 342
第二节 垂死挣扎的保密局 357
第三节 真假保密局的最后闹剧 369

[第一章]

军统的产生背景

第一节 蒋介石运用特务之肇始

刺杀陶成章

1906年，蒋介石在日本东京初次遇见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了借助帮会的力量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任命陈其美为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蒋介石对陈的江湖作风及在帮会中的地位十分折服，两人意气相投，引为知己，后又结为“盟兄弟”。

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于1911年10月3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混迹于上海帮会组织之中。次年1月14日，他奉陈其美之命潜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暗杀了正在那里治病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

蒋介石与陶成章在历史上并无恩怨，但上海光复前后，两人为争夺革命领导权产生了矛盾，陶成章还在孙中山面前斥责陈其美嫖赌成性，致使陈在愤恨之余动了杀机。后来，陈其美与陶成章又为抢做浙江都督发生直接争斗，陈便派蒋介石率杀手，深夜潜入病房，枪击陶氏，陶氏在半梦半醒中被击中左脑而亡。

陶成章被杀一案在国内引起轰动，上海举行了有四千多人参加的民众追悼大会，杭州则万人出动迎接陶氏骨灰回杭。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并立即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蒋介石刺陶之后，拿着陈其美给他的丰厚报偿，匆匆逃往日本躲避，直



陶成章

至是年冬，该案风声渐渐平息，这才悄悄返国潜回宁波老家。^[1]

蒋介石刺陶“一枪成名”，开始了他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活动史，从此现代史书上出现了蒋介石的名字。这样看来，陶成章算是蒋介石的“投名状”。曾有评论说：“刺陶事件对蒋氏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蒋氏登上政治舞台前所从事的第一件反革命的行为。但是由于这行为，更加博得陈其美的青睐与信任。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透过陈的关系，蒋氏逐步靠向江浙财团。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终成为二七年政变以后蒋的最大支持实力。”^[2]

近一个世纪后，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公之于世，“蒋在日记中提到的几件事情显示，蒋早已是孙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选。例如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蒋日后在日记中自白：‘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

[1]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上），二史馆馆藏蒋介石档案，第97页。

[2] 陈鼓应：《蒋介石的第一次暗杀事件》，转引自李敖：《蒋介石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刺陶当时没有日记，是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提及的……当时，陶已耳闻有人要对他不利，躲到医院里，想暂避风头。但蒋还是找到了他……过了十多年后，蒋在日记中曾说道，他认为他做了一件总理孙中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他觉得‘总理信任我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从未向总理报告，他也未和我提过，但我相信总理心中是有所感的’。这说明蒋在国民党权力竞逐中胜出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他个人训练、背景、气魄、眼光和政治上的技巧。”^[1]至于他推论孙中山对他刺陶的支持，并无实在的史料证据。

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从充当刺陶杀手开始逐步登上中国现代政治舞台的。这便注定了他与特工的渊源关系。

有人撰文分析说：“蒋介石当年之所以充当杀手，和他的性格、教育环境及其交游有重大的关系。”关于蒋氏的个人性格，据他自己的描述是：“幼性顽钝，弗受绳尺”，“放嬉跳跃”，常遭“刀棒之伤”。^[2]他的老师毛思诚也记述说，蒋在学堂常“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个性粗鲁，动辄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反抗他，他是不惜以拳力支持其领导权的”^[3]。他的这种暴戾性格，直到成年以后仍无太大变化，正如蒋介石自己在给胡汉民、汪精卫的一封信中所自承的那样：“弟本一贪逸恶劳之人，亦一娇养成性之人……至今不惟皮玩难改，而轻浮暴戾，更甚于昔日。”^[4]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特征，加上后来他所受到的“粗浅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德国“铁血主义”的崇拜、混迹上海滩时所受陈其美等人帮会作风之影响，终而形成他“上海滩”帮会流氓的心态倾向，而这种心态中的狂暴、偏狭、蛮干以及严密组织、注重情报搜集、以效忠个人为中心等成分，是他后来组织、使用特工机构的直接思想根源。

[1] 蓝慧：《55年日记揭开蒋介石内心隐秘》，载《参考消息》2007年10月2日第6版。

[2] 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二史馆藏书。

[3] 董显光：《蒋“总统”传》，二史馆藏书。

[4] 蒋介石：《与展堂、精卫书》，载《蒋主席名著全集》第四集，（台）复兴出版社1947年版，第1205页。

苏俄克格勃之启发

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蒋介石奉命赴山东，出任居正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虽工作负责，但仍因“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1]。尽管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暴躁性格有过严厉批评并曾加以规劝：“兄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齟齬难合，然为党员之重大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2]但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能骤然改变的，最后仍是“不得已，乃悄然离去”^[3]。

蒋介石这一去便到了上海，在交易所从事股票投机生意，同时参与东南党务与军事工作。

1918年3月12日，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召离沪赴粤，正式进入革命大本营。其后他又因时常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相左而闹情绪，往返于沪粤之间。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事发之时，他受到孙中山召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取得了孙的信任与器重。从此，孙、蒋由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渐渐发展为亲信关系，蒋介石由此取得了进入国民党最高层的资本。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实行联共政策，于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访问，任命蒋介石为代表团团长，对他表示出充分的信任。代表团团员有中共主要干部张太雷以及沈玄庐、王登云等人，他们在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于11月29日回国。

孙中山派蒋介石访苏的意图，是要他学习苏联治党治国的经验，回国后推进国共合作与北伐大业。然而，蒋介石在苏联经过与俄方领导人的会谈及考察，反而对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意图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与反感情绪。他回国后在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写道：“以弟观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主流，绝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

[1] 秦瘦鸥：《蒋介石先生全集——蒋介石先生传》，二史馆藏书，第34页。

[2]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上），二史馆藏蒋介石档案，第97页。

[3] 秦瘦鸥：《蒋介石先生全集——蒋介石先生传》，二史馆藏书，第34页。

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不为郑重，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1] 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亦有一大收获，他没有说，却有旁证可引，那就是他对苏联“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即克格勃前身）情报特工机构的发达及作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其镇压反对派的效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决意效仿之。

国民党两大特工组织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的创始人陈立夫多年后回忆说：“蒋公曾去苏联，知道该国政治之运用甚详，而其调统组织之严密，实为安定内部之主要因素，因此十六年清党之后，蒋公就要我在他所任部长的组织部之下，组织成立调查科。”^[2] 这样看来，蒋介石成立特工组织的设想，也是受了苏联经验的启发。

对德意法西斯之效仿

孙中山去世后，经过一番争斗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在对外方针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认为，未来中国之外患，一是苏俄，二是日本，两者相比，苏俄的威胁更居首位。因此，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在逐步掌握国民党统治权力的同时，便开始有计划地疏远苏联。首先是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中共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力量，而后又公然反对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发动“清党”，对俄绝交。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中苏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

对苏绝交之后，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后留下的空缺。在英美对华持观望态度的情况下，德国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失去了强国地位，沦为中国的平等伙伴。蒋介石看中其尚存的国家工业、科技人才实力基础，加上他对德意法西斯强权的崇拜，于是坚定了引进

[1] 《蒋介石致廖仲恺函》，载《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第12—13页。

[2]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思曾等著：《细说中统军统》代序，（台）传记文学社1992年版。

德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决心。同时，日耳曼民族所具有的“认真、勤俭、遵纪、执着”的民族精神，亦正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被认为是针对旧中国贫穷、散漫、落后的国情，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蒋介石还让次子蒋纬国赴德留学，并劝诫之：“中国应该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钝，德国是唯一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养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蒋介石还曾进一步明确提出：“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1]

20世纪20年代，出自意大利语的“Fascism”一词传入中国，起初被音译为“泛牺”或意译为“棒喝”，表示“持棒喝打，振顽起愚”之意，成为一种对武力挽救、强力解决问题的团体暴力主义的崇拜。后来演绎为“法西斯蒂”或“法西斯主义”，其意不仅是指意大利，也泛指那些进行严厉政府控制，国家独揽大权，对民众实行军事化统治与组织训练的国家形式。在中国，人们对希特勒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方式研究颇多，并把它与德国历史上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联系，以之为“法西斯主义”正宗；相反，则淡化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源头的观念，似乎意大利的法西斯从来就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

在开始阶段，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残暴掠夺奴役的面目尚未暴露，其名声还没腐臭；相反的，它作为有力地增强国家机器统治效能的良方，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缺少民主习惯的国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时的中国便是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及军政界不少人士普遍对法西斯主义具有兴趣，大量的出版物都在介绍、评论法西斯主义，并具体论述其与中国、与执政的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关系。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们，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纷纷出访德意，大批的留学生、军校学员、商界、军界专访团被派往德意，当局曾试图全盘移植法西

[1] 《德国驻华顾问团工作纪要》，（台）“国防部”史政局1969年编印，第4页。

斯主义模式到中国。

在蒋介石的“联德”计划中，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纳粹党怎样在党内“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的成功”^[1]。

蒋介石对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式的“西方国家正在向上的政党”的崇拜几乎到了顶点，他认为，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加上法西斯的精神就是今日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在比较了三种主义之后，蒋介石得出结论说：“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把建立这种“有效能的”独裁统治说成是民意，“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2]。

1934年9月11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又说：“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元首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3]这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言辞，暴露了蒋介石的心态。

1935年，蒋介石在对他的准特务组织“蓝衣社”成员的讲话中更直白地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

[1] 德国联邦档案馆：《鲍尔遗件 NO：62》，第229—230页。转引自《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2] 河阳等著：《蒋介石揭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3] 河阳等著：《蒋介石揭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要眼下将能救中国的某种方法……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对衰弱社会的刺激。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1]

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不但在于言论，而且贯彻于行动。除了实行“权随人移”的独裁统治，他在很早便开始着手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想靠恐怖与暴虐的手段来驾驭部下，并镇压人民的反抗。德意法西斯统治的一大明显特征是对内镇压功能的有效加强，而其中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建立庞大、严密、正规的特务网。不但对外搜集情报，进行破坏与间谍战，而且对内监视民众，镇压反对派，进而用于内部肃清政权组织，控制部属，使特工组织成为一把“多刃剑”。蒋介石受德意法西斯的启发，片面地吸取了苏联政权的统治经验，面对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政治，决心建立“有效能的统治权”，因此采用特务组织与手段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蒋介石的特务思想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管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

[1] 转引自〔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1]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第二节 “特工之王”崭露头角

1926年9月，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招生应试者中，出现了一位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结识的青年，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脸庞轮廓分明，在一众参加考试的黄埔学生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了勉励自己，他刚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戴笠，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后来的国民党“特工之王”。

关于戴笠其人，一些国民党的官书将他描绘成天生的谍报专家、特工天才，而对立者则斥之为魔鬼与毫无人性的刽子手。客观地说，他思维活络、嗅觉敏锐，能善变求新，加上一些与生俱来的乡村无赖性格与对上死心塌地效忠的封建思想，使他在情报搜集与分析方面的“天资”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环境下，他迅速脱颖而出并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

[1]《蒋“总统”全集》第十二卷，第6—7页。转引自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黄埔纷争

戴笠，字雨农，原名戴春风，1897年5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峡口镇。1910年春，考入江山县文溪小学，三年后进入杭州浙江省立一中。后因违反校纪被开除，投入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学兵营当兵，战败后逃回家。他不甘吃苦，急于四处寻找成名出路。1915年，他与毛秀丛结婚。1922年冬，他到了上海，经大同乡戴季陶介绍，结识了蒋介石，并一度为他们在交易所做股票投机生意当跑腿伙计，因头脑灵活，办事尽心，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蒋介石的股票生意失败后，戴笠在沪失去生活来源，于1924年回乡办自卫团，自任团长。两年后，自卫团又被解散。正当他走投无路之时，在街头巧遇其幼时同学毛人凤，毛人凤当时正在广州黄埔军校当学员，他向戴笠描述了自己在黄埔军校读书的革命生活，说“革命朝气在黄埔”，引起了生性好动的戴笠的极大兴趣。

黄埔军校，全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军校秉持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戴笠认准这是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立即决定赴粤，并由戴春风改名“戴笠”以示弃旧图新的决心。经过两次考试，他考上黄埔六期，编入入伍生团第17连，由此开始了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戴笠在黄埔埋头学习，平时言行谨慎，课余时间，留心观察周围师生的举动，记载各种有用的资讯，尤其是同学中中共党员的活动，他相信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1927年4月，蒋介石依仗军权另组中央，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开始反共“清党”。戴笠在黄埔军校受蒋介石政治集团反共立场及理论的影响，对“清党”反共持赞同态度。他一反常态，在同学中发表反共演讲，大谈国共两党必然分裂的原因与“清党”的必要，表现十分积极。不久，蒋介石派他的侍从副官、黄埔二期生胡靖安到黄埔军校开展“清党”工作，戴笠向他提供了有关校内师生的许多情报，使校方轻而易举地逮捕了二十多名共产党员，

由此，戴笠受到胡靖安的赏识。胡出任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后，开始有意识地笼络和栽培戴笠，将他委为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埔军校骑兵营调往苏州驻防。在党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准备下野，黄埔学生中掀起挽留之风，戴笠等三人前往蒋的老家浙江奉化，代表骑兵营面见蒋介石请求他复出。这次见面，使蒋对戴笠加深了印象。

戴笠回到苏州后，因蒋已下野，骑兵营经费困难，学员渐渐散去，他便到了上海，失去踪迹。据他后来自称是“被派到北伐军司令部服务”，其实他是正式投靠了胡靖安，开始以情报工作为业。他利用在上海的旧关系搜集各种情报，渐渐学会了分析研究情报的价值，成为胡靖安的重要助手。

从入学到离开苏州骑兵营，戴笠在黄埔就读的时间共计不过一年，实际为黄埔军校肄业，但后来军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承认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

效忠于蒋

1927年8月，蒋介石因在国民党内部受到汪派及桂系等的共同攻击，四面楚歌，急于用非常手段来对付政敌。他授意胡靖安离开黄埔，在上海专事联络黄埔同学搜集各方情报之事，成立了黄埔同学联络小组，负责搜集各方情报、监视部队。戴笠与他的同学东方白、刘艺舟、蔡劲军等在胡靖安的联络小组里干了一段时间，由于胡靖安的不得力，戴笠等虽然卖力工作，但并没受到相应的重视。这一时期是戴笠从蒋介石处领取经费从事专业特务工作的开始。9月，蒋介石被迫东渡日本，下野之前为避免授人口实，他令联络小组停止活动。胡靖安在上海把蒋介石给的遣散费独吞后逃走，戴笠在无奈之中靠拜把兄弟杜月笙的救济才渡过了难关。

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派胡靖安赴德国留学。临别前，蒋接受了胡的推荐，任命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参谋，接替胡主持在上海的联络小组的工作，戴笠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为蒋介石出掌情报特工工作的生涯。

戴笠出掌蒋介石私人系统特务工作后，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他认准跟蒋有前途，拼命卖力，但在开始阶段，他的工作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